

人的发展:文化共享工程效果反思^{*}

曹 凌 杨玉麟 林 强

摘 要 以社会学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差序格局理论为工具,对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问题进行探讨。研究认为,从人的发展角度思考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应构建政府组织与家庭相结合的扩散模式,以赢得更多的采纳者,促进文化共享工程的广度发展;应将文化共享工程与日常生活方式相结合,以形成对先进文化接受和认同的文化基础,促进文化共享工程的深度发展;应通过数字化生活提升社会弱势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和适应信息社会的能力。只有定位于人的发展,文化共享工程才能持续发展。参考文献 15。

关键词 文化共享工程 人的发展 创新扩散 数字化生活

分类号 G240

Effects of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Project

Cao Ling, Yang Yulin & Lin Qi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ory and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 theory to conduct research on effects of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Project.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om the prospective of human development, we should construct the model that combines family terminal systems and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to gain more users an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ject extensively. What's more, we should combine the project with daily life to shape the culture basis of accepting and acknowledging advanced culture to promote the project profoundly. Furthermore, the vulnerable groups in the society should improve self-development capacities and the abilities to adapt to information society through digital life. In conclusion, only by emphasizing human development can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 Project enjo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5 refs.

KEY WORDS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Project. Human development.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Digital life.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文化共享工程基础设施和文化资源建设已初具规模。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将文化共享工程置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从理论上审视、反思已经走过的路径,思考、明确新阶段的目标定位,为文化共享工程的深入持久发展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效果研究应承担的使命。

1 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研究:人的发展视角

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研究的重要依据,是由其本质所决定的。社会转型期的背景,赋予了揭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的重要视角,即人的发展视角,因为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西部地区文化共享工程实施效果及其长效发展研究”(编号:11BTQ003)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曹凌, Email: caolaoshixg@126.com

文化共享工程的目标本身就包含着“人”对效果的基本诉求^[1]。这一视角阐释了文化共享工程的目标、价值、意义以及文化共享工程的本质;效果问题,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突出了人的发展,文化共享工程就应是一个赋能赋权的扩散过程。这意味着文化共享工程扩散的效果研究,不仅仅是指对受益人群及其使用效果的探讨,更是希望从人的发展角度探讨,在社会转型期,如何通过文化共享工程提升人的自我发展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以及如何给予、支持、保障弱势群体这一权利。

在人的发展框架下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不难看出,这一重要命题在其中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体现。文化共享工程的主要受益群体是农民工、农村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等少有机会接触到文化信息资源的人群。文化共享工程的应用隐含着信息技术、知识、能力的要求,这些客观条件影响其扩散效果。因而,效果研究需要从人的发展视角对文化共享工程扩散的广度和深度进行反思,以确定新阶段发展的目标定位。

2 效果与扩散:广度的反思

文化共享工程的受益群体决定了其扩散的广度,也决定了最终的成败。罗杰斯创新扩散理论认为,创新事物在社会系统中形成扩散的前提是必须有一定数量的人采纳这种创新事物^{[2]309}。在发展中国家,人际关系渠道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178}。创新扩散理论提出的采纳人群及人际关系渠道的问题是效果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2]21}。但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模式是否注意到社会基层人际关系渠道?是否注意到我国人际关系扩散渠道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又是如何影响扩散效果,文化共享工程又应以怎样的扩散模式赢得众多的采纳者?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是以“水波纹”的方式即差序格局扩散开的,居于水波纹中心的是基于婚姻和血缘的家庭^[3]。以家庭为中心的扩散,实质是基于家庭

成员的人际关系扩散,对信息的接受采纳主要依赖于家庭成员的意见和经验,因而家庭是其成员获得外部信息非常重要的渠道。在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中,社会沟通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在我国农村和贫困、边远地区,由于生活结构还是以社会—家庭一个人为主,家庭是家庭成员间、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的联结中心、交流中心和信息扩散中心。特别是受年龄、性别、文化水平、亲缘信任关系、社会接受能力、沟通能力与交往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家庭依然是这些人群与外界沟通传播的重要渠道,差序格局现象依然存在,而且越是在社会基层这一表现越是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信息扩散模式,依照的是社会—家庭一个人的差序格局结构,扩散动力是靠人们生活需求产生的内力推动,这种自发、自觉、自愿扩散的模式具有广泛性和持久性。但人际关系渠道的扩散模式是一种自发、被动、低效的扩散模式,作为文化共享工程,其扩散如果仅仅依靠人际关系渠道的扩散模式,会影响和限制其发展速度和效果。

政府主导的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模式,其结构是由全国文化共享中心—省文化共享中心—县文化共享分中心—基层文化站构建的金字塔式的层级结构,扩散的动力主要是靠行政命令与行政权力的外部推动,这种以层级组织为节点逐级推动扩散的模式具有主导性、主动性和快速推动的特征,是典型的组织渠道的扩散模式。但由于这种组织扩散模式忽略了作为人际关系渠道中非常重要的家庭人际关系渠道,一方面与当前社会基层以家庭为中心的扩散模式之间缺少衔接,使得组织渠道的扩散系统在社会基层出现了脱节,对扩散的广度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依赖于组织扩散渠道的系统缺少了生活需求的内在动力,易偏离人们真实的生活需求,造成组织目标与人们实际需求的脱节,使扩散的效果受到影响^[4]。面对“差序格局”的现象,可利用差序格局理论构建适应于农村、贫困和边远地区的扩散模式,将两种不同扩散渠道结合在一起,即将组织扩散渠道延伸到家庭,将家庭作为

文化共享工程扩散系统的单元、载体和结合点,通过基层文化站与家庭的连接,形成全国文化共享中心—省文化共享中心—基层文化站—家庭一个人的扩散模式,借助家庭人际关系渠道促进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只有将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嵌入到具体的家庭生活活动中,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能力,文化共享工程才有了扩散的现实基础。

以家庭为扩散单元引发的变化,首先是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内容变化。文化共享工程的基层工作站,除提供文化信息资源的服务之外,还应成为家庭信息技术能力培养和数字化生活的扶助中心。如利用文化共享工程可以帮助农村留守家庭学习网上视频聊天、手机通话及短信收发等,以便于实现信息交流与沟通;可以帮助家庭网上挂号、网上订票、网上购物,获取打工信息、农产品买卖信息、实现影视娱乐等,以达到文化信息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以家庭为扩散单元,可以扩大社会弱势群体人际关系的沟通渠道,对人们的交往、参与、信任和自我认同产生积极影响,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融入信息社会的有效方式^[5]。

其次是扩散结构的变化:扩散结构从单一的政府组织面对个人的扩散结构,转变为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共同面对家庭、家庭面对个人的扩散结构,形成多元的扩散渠道。

(1)家庭及其成员扩散渠道。家庭是文化共享工程扩散的重要节点,家庭成员及家庭间相互影响、带动,有益于形成人际关系渠道的再次扩散。一个家庭或家庭成员对文化共享工程的采纳意愿,可以影响到其他家庭和家庭成员的采纳意愿;一个家庭成员的上网意愿,可以带动其他家庭成员的上网意愿。家庭成员、家庭间的互动,可以带动家庭数字化生活能力的扩散,许多技术的普及过程都证明了这种家庭间传播扩散的有效性^[6]。

(2)学校扩散渠道。在社会基层,中小学具有发挥文化共享工程效益的最佳优势,是文化共享工程应用的参与力量与扩散力量。以学校为文化共

享工程的扩散渠道,可以形成以教师带动学生、学生带动家庭中的老人、妇女的传递链,推动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7]。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文化信息资源可以极大地丰富教学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贫困地区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

(3)企业扩散渠道。文化共享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硬件与软件资源的支持,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支持。企业扩散渠道可以弥补文化共享工程人力资源的不足,发挥企业在人才、资金、技术、知识方面的优势,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如电子产品生产、销售企业在推广电器产品的同时,可以对购买其产品的用户进行操作和应用培训,通过电子产品的应用,带动文化共享工程资源的应用,通过提高家庭对电子产品的应用能力,提高家庭对文化共享工程资源的应用能力,为家庭人际关系渠道的扩散提供支持。

(4)大众媒介扩散渠道。在文化资源扩散方面,大众媒介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特别是电视媒介,已经成为社会基层家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因而,借助大众媒介特别是电视媒介对家庭的影响力,可以促进文化共享工程的各种资源更加广泛地传播,促进人们对文化共享工程的认同^{[2]318}。如文化共享工程可与电视媒介合作,为文化共享工程开设固定的电视频道,借助成熟的电视网络,既能节省人力物力,又能促进文化信息资源的广泛传播。

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的发挥,无疑与参与者、使用者有关。参与者越多,推动力量越大,带动效果越明显,扩散效果越显著。多元化扩散结构,提供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空间,即文化共享工程不是简单地依赖于政府组织的推动,社会力量以及社会弱势群体也将成为扩散的推动力量。为此,文化共享工程应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扩大参与主体,共同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扶助服务。

3 效果与扩散:深度的反思

文化共享工程的实质是关于人的工程,扩散的

过程也是先进文化的认同、接受与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了文化共享工程的深度,也决定了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与效果。关键是,文化共享工程应如何完成先进文化的核心价值从表层到本质、从认知到内化的深层次扩散,并选择什么角度来扩散?

文化共享工程的扩散模式,应是一种基于人们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潜在影响的模式。人们只有接受了一种先进的生活方式,对其蕴含的先进文化的接受才是主动的、自觉自愿的行为。如果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活动方式、思维方式和能力的总和,那么文化与生活方式就应是一致的^[8]。一方面,文化是既有生活方式的积淀和选择,可规范、指引人们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生活构成了文化的基础和根本。人们的衣食住行形成了自然稳定的日常生活方式,反映了人们生存本能,表达了风俗习惯、传统和经验、家庭和血缘、意识和情感的内涵,这就是文化的根基,是对人们产生深层次影响的文化根基。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不被触动,仅仅靠外力推动先进文化的扩散,必然受到传统日常生活方式的排斥。因而,文化共享工程只有扩展到人们的生活层面,促进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意识的改变才可能从表层进入深层,才能真正触动文化的根基,形成对先进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对人的改变才可能是深层次的变化。

信息社会的文化,是人们借助于信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从事信息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社会所特有的文化形态,人们在信息社会中的生活样式,是数字生活的样式,具有沟通、互动、创新的特征^[9]。一位农民工描述自己在数字化生活中的状态是:电视机顶盒设置不了,拿着电子产品说明书不会操作,不会网上买票,不会网上购物,不会预约挂号,以前只能跟人家拼体力,现在体力都没得拼了,真的感觉像是要被社会淘汰了^[10]。这意味着,人们对信息社会的适应与发展,需要挣脱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羁绊,对传统的超越,还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对传统日常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与重建。

针对这一问题,文化共享工程要承担的,不仅是文化传承和娱乐,不仅仅是文化信息资源的提供与利用,还应包括对先进文化的引导、培育、解释和说服,即用信息社会的数字化生活方式影响、替代传统的生活方式,通过数字化生活方式形成接受先进文化的生活基础,将数字化生活作为先进文化扩散的最重要的载体,以个性、创新、竞争、参与、互动的文化根基动摇落后封闭的文化根基,逐步完成对数字化生活的认知、内化,从而实现先进文化的认知、内化,最终实现先进文化的扩散^{[2]426}。

(1) 认知数字化生活方式,接受先进文化。人们对数字化生活的认知,是将数字化生活所提供的知识和技术吸收到个体原有的知识结构中的过程^[11]。数字化生活给予人们新的认知资源、认知渠道,以及数字化生活方式所蕴含的价值观,在此过程中逐步形成接受信息技术和先进文化的愿望、需求和动机,获得对文化共享工程创新的认知,对先进文化的认同。例如信息技术在数字化生活中的应用,是表达知识的重要方法,也是促进人们认知的重要方式^[12]。网络视频以真实的场景实现了跨越地域的“面对面的交流”,扩大了获取、交流知识的范围;多媒体技术以形象化、可视化的知识表达,弥补了传统语言、文字表达形式的不足,对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如老人、低龄儿童更适用;交互技术提供了交流工具,可以帮助人们传播交流信息、获取知识,也为人际关系扩散模式提供了实现途径。从这个意义上,数字化生活为接受先进文化提供了认知基础,有了数字化生活能力,弱势群体才有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2) 内化数字化生活方式,实现先进文化内化。在认知的基础上,内化数字化生活方式的文化内涵,是文化共享工程深度扩散最重要的环节,也只有通过先进文化内化,文化共享工程对人的发展的深层次效果才能体现。

数字化生活的文化内化,是人们将认知转化为内部思维的过程,也是主体应用知识自我建构、形成其人格一部分的过程^[13],是主动接受与参与变

化的过程^[14]。完成这一过程,需要人们真实、反复地体验数字化生活方式的特征,并逐步内化为个人的自然意识和文化素质,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形成新的价值观。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生活的真实环境为人们内化先进文化提供了生活基础,有利于人们将数字化生活潜在的知识文化转化为主体自身的知识文化,最终提升人的能力,完成先进文化的深层次扩散^[15]。由此可见,数字化生活方式是实现先进文化内化的重要途径。

4 结论

人的发展,是评价文化共享工程效果的核心。

首先,社会发展的关键是人的发展。文化共享工程通过先进文化的扩散促进人与社会的适应,促进人的能力的提高,实现人的发展是文化共享工程的起点与归宿。

其次,扶助社会弱势群体融入信息社会生活,是文化共享工程的重要责任。数字化生活是社会

弱势群体接受先进文化的载体,也是提升其适应能力、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文化共享工程应该从生活方式即文化根基对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潜移默化地进行深层次改变,通过提高人们的数字化生活能力,提升人们对先进文化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提升人的发展能力。

以家庭为单元的扩散模式,是与农村、贫困和边远地区现实生活相适应的扩散模式。这种模式可使文化共享工程的组织目标与社会真实的生活需求紧密结合,为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支撑。

综上所述,文化共享工程的效果问题不仅是文化信息资源的需求、选择、获取、利用问题,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是先进文化和先进生活方式对人的培育问题,是扶助社会弱势群体融入信息社会的问题。文化共享工程在新的发展阶段,其目标应该也必须定位于促进人的发展。只有如此,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 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1.(Zhou Baohua. Effects research: The history of ideas of media-audience relationship[M].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
- [2] 埃弗雷特·M·罗杰斯.创新的扩散[M].辛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Everett M Rogers.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M]. Xin Xin, Tran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2002.)
-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2-25.(Fei Xiaotong. Rural China[M].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06: 22-25.)
- [4] 黄兴华.试析欠发达地区农村文化生活方式的重构路径[J].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4):38-41.(Huang Xinghua. Trying to analyze the reconstructing path of rural culture lifestyle in underdeveloped areas[J]. Journal of Fujian Institute of Socialism, 2012(4): 38-41.)
- [5] European Commission. A digital agenda for Europe[EB/OL]. [2011-01-06].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com:2010:0245;fin;en;pdf>.
- [6] 宋煜.基于“差序格局”理论的家庭和社区信息化应用策略[J].学习与实践,2009(9):117-125.(Song Yu. The applicative strategy of family-community informationization which based on the Differential Pattern theory [J]. Study and Practice, 2009(9): 117-125.)
- [7] 刘璇,徐珊,王萱.国际视野下的“共享工程”[J].图书馆建设,2008(2):19-24.(Liu Xuan, Xu Shan, Wang Xuan.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projec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J]. Library Development, 2008

(2):19-24.)

- [8] 梅敏君,潘于旭.论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建构作用[J].浙江社会科学,2012(5):120-123. (Mei Minjun, Pan Yuxu. The construction effects of cultural on life style[J]. Zhejiang Social Sciences, 2012(5):120-123.)
- [9] 魏钢,代金平,陈纯柱.信息文化涵义探析[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23(1):5-8,48. (Wei Gang, Dai Jinping, Chen Chunzhu. Study on meaning of information culture [J].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2007, 23(1):5-8, 48.)
- [10] 陈晨.莫让“信息弱势群体”掉队[J].半月谈,2013(3):49-51. (Chen Chen. Do not let the information vulnerable groups fall behind with others [J]. China Comment, 2013(3):49-51.)
- [11] 张春兴.现代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4. (Zhang Chunxing. The modern psychology[M].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1998:4.)
- [12] 郑晓齐,董杜骄,何雄.信息技术对人类认知活动的影响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2(3):118-120. (Zheng Xiaoqi, Dong Dujiao, He Xiong. The impact analysis of human cognitive activities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J]. China Soft Science, 2002(3):118-120.)
- [13] 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1221.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The grand dictionary[M].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1999:1221.)
- [14] 彭湃,梁红.内化论视阈中大学通识教育的现实困境与变革[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66-70. (Peng Pai, Liang Hong. Realistic dilemma and reform measures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visual threshold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lization[J].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0(6):66-70.)
- [15] 徐益.内化对信息素质教育的诠释[J].情报科学,2007,25(5):795-800. (Xu Yi. Information quality education within the psycholog interpretation[J]. Information Science, 2007, 25(5):795-800.)

曹 凌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通讯地址:西安市长安区郭杜学府大道1号。邮编:710127。

杨玉麟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通讯地址同上。

林 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助理馆员。通讯地址:西安市西沣路兴隆段266号。邮编:710126。

(收稿日期:2013-08-24)